

##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中国学生来到美国？

柯伟林 (William C. Kirby)

在21世纪初，中国学生约占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的全部国际学生的10%，如今该比例已升至31%以上，位居次席的印度仅为17%左右。与之对应，在全部国际学生缴付给美国各大学的学费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是来自中国留学生的。按照国际教育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报告，2015–2016学年有328547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的高等院校就读，占美国全部国际学生总数的31.5%。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占比从2000年的16%提高至2015年的22%，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该校的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哈佛大学并非特例，美国的许多大学也出现类似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中国的大学学额不足以容纳所有高中毕业生吗？事实并非如此。

1978年，在中国各大学因为文化大革命被关闭十年之后，它们的注册学生人数约为86万名。至1990年，这一数字逐步提升，约有200万名学生在中国的大学注册。至2000年，中国的大学注册学生人数又进一步攀升至600万名。自此之后，所有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正式学生总数均大幅增加。目前，中国的

高等教育机构有超过3600万名学生。在2000年，中国的大学生人数约为美国的一半，如今已是美国的两倍。中国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超过美国和印度之和。简而言之，中国并不缺大学入学名额。

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优秀的大学吗？也不是。

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全球最具活力的一部分（尽管规模较小），有公立和私立、本地和国外的杰出大学。在经历为期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统治和受到苏联的影响后，中国的大学又重新在世界上受到关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学校如今经常在各种国际排名上跻身全球第30到40位的行列。与之相比，尽管德国的大学曾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拥有国际一流的水准，但在今天几乎所有排名上都只有一所德国的大学位列全球前50名。

肯定的是，美国的大学目前在世界精英大学的排名上占主导地位，但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最优秀和聪明的学生并没有因此大规模涌入美国大学就读，尤其是在本科生阶段。他们会入读本地的名牌大学。中国则明显不同：愈来愈多中国最出色的学生—如今本科生人数已和研究生持平—希望到美国的大学接受教育。

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有很多原因，其中某些与历史有关。在共产党于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美国就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19世纪，清政府派往海外的第一个教育使团正是前往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佛德市（Hartford, Connecticut）。尽管日本在1900年代早期是一个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德国和英国也是某些学科的明智之选，但美国的大学依然是大部分中国海外留学生选择的目的地。

事实上，为年轻人进入美国大学做准备，正是中国最顶尖学府之一清华大学创办时的使命。由清政府建立的清华学堂，最开始是为挑选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作准备的预科学校。在伊

利诺伊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 校长詹姆士 (Edmund J. James) 催促下，美国政府返还了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1911年创办清华学堂的费用。詹姆士告诉美国总统老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哪个国家能成功教育今天这代中国青年人……哪个国家就能在道德、知识与商业的影响力上收获最大的回报”。在创办后的首十年里，清华大学修建了一个美式校园——其杰佛逊风格的大礼堂沿袭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大礼堂——为学生赴美留学做准备。清华大学后来发展为一所优秀的综合型大学，并在起初的几十年里一直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

最早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且有中国背景（无论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还是台湾）的五位学者都曾在美国的大学求学或执教。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里还包括于1927-1949年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宋子文（哈佛大学）、孔祥熙（欧柏林学院）、胡适（康奈尔大学）、宋美龄（卫斯理女子学院）等。在商界，现代中国纺织业从1910年代至今的多位革命性人物，如美亚丝绸厂公司 (Meiya) 的蔡声白、服装集团联业制衣 (TAL) 的杨元龙、纺织业巨头溢达集团 (Esquel) 的杨敏德——同一家族的三代人——分别在理海大学 (Lehigh)、洛威尔纺织学院 (Lowell Tech) 与麻省理工学院 (MIT) 接受工程学教育。这个显赫纺织世家的下一代、时尚品牌“派” (PYE) 的总监潘楚颖则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来美国学习的中国人以显耀的方式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今天的哈佛大学校园内有块大理石石碑，是由接近一千名中国校友于1936年献给母校的建校300周年礼物。其碑文据称是由同年获得哈佛大学荣誉学位的胡适题写：“国家之所以兴也繇于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繇于学……是说也，征之于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之矣……我国为东方文化古国，然世运推移，日新月异；志学之士复负笈海外以求深造。”

在共产党于1949年夺取中国大陆后，赴美留学的新学生浪

潮中断了三十年。某些留学生选择在毕业前回到中国，例如哈佛大学1952年的毕业生冀朝铸，他后来成为高级外交官，并负责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翻译。同时，美国在1949年因为中国知识精英难民潮的涌入而受益，这些人填补几十年里美国各大学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实力。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亦同样如是。

如今涌入美国的中国学生潮是基于过去这些经历，但规模远超以往。部分原因在于当代中国教育的扩展、品质和广泛性。中国的顶尖公立高中属全球一流学校的行列，其毕业生足以赢得世界最具竞争力大学的青睐。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有能力入读全球最领先的博士学位课程，他们的素质体现在美国博士学位课程里中国人所占的高比例上，这些课程几乎完全是基于学术成绩来录取学生。在2016年，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占美国全部一年级的国际博士生的34%。由于中国学生从大学毕业时必须通过英语考试，这些研究生在语言上足以应付赴美留学的挑战。

从社区大学，到文理学院以及公立和私立的综合性大学，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增长均同样源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最近几十年里的扩张、多样性以及财务需求。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不止一个入口，而是有数千个。如果说中国的博士生主要靠美国资助的奖学金来支持学业（例如，哈佛大学每年提供约2000万美元的资助给中国的博士生），大多数中国本科生则没有财务支助，反而支付高昂学费（在私立大学是付全额学费；在公立大学是付外州学生的学费）给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依然处境艰难的美国高等院校。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资料，美国高等院校的中国学生在2015年为美国经济贡献超过110亿美元。这正是许多美国大学为何如此积极招收中国本科生的原因之一。作为该市场的一个指标，中国出现了发展强劲的教育咨询产业，专门帮助年轻人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

除了因为美国大学的开放性与可及性以外，中国父母还普遍认为美国的教育就是比中国更好。正如许多美国教育工作者

(不无道理地)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比美国学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也认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更会创新且具有创造性思考能力,而虽然有过古代发明和现代革命成果,但是中国人更为“传统”、“受规则束缚”和“死记硬背”(虽然最近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学生在批判性思维上超过“创新”的美国学生)。对于中国在创新方面落后的说法,有人归咎于中国学生必须通过全国高校招生考试(即高考)才能入读本地大学的残酷过程,堪称有位学者所说的“中国考试地狱”的现代版本。为入读大学而如此全身心注重考试成绩的学生怎可能成为创新者?

这样令人畏惧和疲惫的高考是中国学生更愿意出国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有多达940万人在2016年6月参加高考,这个数字却比上年减少了2万名学生。在北京、辽宁和江苏,2016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人数创下历史新低。部分原因可以归因于现在许多精英高中会提供两条学习轨道:一条是让学生为高考做准备,另一条则是为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而设的。后者的课程会为学生提供培训,以应付入读美国大学所需的标准考试,如托福(TOEFL)和SAT考试等。2015年,总共有超过50万名高中生入读海外的大学。

对本科教育来说,中国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显然很相信美国的院校对其人文导向或通识教育课程的自豪感。这些院校声称类似课程能培养出有宽广知识背景的“领导者”,以肩负起世界责任。此概念是美国大量本科教育课程的核心:需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批判性的终身学习者,而不仅是为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进行训练。实际上,我们很难找到培育不出“领导者”的美国大学,似乎没有学校满足于迎合可能拥有更庞大追随者的市场。中国各大学的校长也接受了美国大学校长的说法,投放大量精力设计中国背景的通识和人文教育课程。当哈佛的本科学院于2006年用新的通识教育课程(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取代核心课程(Core Program)时,许多课程报告和推荐意见在北京被人仔细研读,一如在麻省剑桥市的本校一样。由于几

乎所有中国顶尖大学都在尝试通识教育模式，这种在中国模仿美国通识教育的现象提高了此概念的声誉，并引发家长思考：为什么不去追求原装产品，赴美留学呢？

相比中国国内，外国更肯定中国教育体系的实力。虽然近年来没有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像中国般迅速进步，但在国内却有大量批评的声音。与英国或美国的排名相比，中国的全球研究型大学排名对本地院校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只属前50-100名的级别。中国的家长、学生和教职员还对许多问题大加抨击：必修课太多、优秀的授课很少得到褒奖、在突然扩张的教育体系培育之下的毕业生未必能找到好工作，以及中国限制开放自由的思想交流——而这至少在原则上是美国本科教育的核心。顶尖的中国大学都是公营的，而共产党的书记通常位列校长之前（校长在任何时候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共产党在高等教育中担当的角色会一直延续——实际上还在扩大。这显然是追求“世界一流”地位的中国各大学要应对的最重大的挑战。

中国高等教育在竞争力方面会面临的挑战可以归纳为一个简单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不管其如何定义——能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体制下存在吗？或许可以，但必须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面临很大政治压力，但依然成为全球翘楚，部分原因是它们保持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培养和保护了别具创意的思想家。今天的中国大学吹嘘拥有顶尖的学者和全球最优秀的学生，但这些学生仍被迫参加有关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的必修课，学习好像漫画书一样的自己国家的历史。尽管有新的通识教育课程，可是在政治和历史等领域上，中国的大学生为毕业而必须学习的内容与他们所知道的真相之间的差距逐年扩大。在习近平主席加强政治控制的年代，空洞的政治口号宣传每周要耗费学生数小时的时间（更不用说教职员和管理人员），这让中国的大学面临产生两类“领导者”的风险：愤世嫉俗者与机会主义者。



或许作为默认结果，美国的大学将继续享受作为培育领导者的创新场所的幸福时光。毕竟，现实中的中国领导也在把自己的子女送往美国的大学，而且人数还在增加。从家长把孩子送往哪里上学，我们就能了解很多信息。在1920-1930年代，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把儿子送往当时的两大强国：前往苏联的蒋经国入读专门培养革命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而前往德国的蒋纬国则在慕尼黑军官学校（Kriegsschule Munchen）受训。如今，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包括习近平主席及其主要对手前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子女们都曾在美国的知名院校就读。甚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些中国最有名望和人脉的学校，现在都被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名校抢走入读的学生。

这种情形将持续多久？美国的大学或许在20世纪受到各国羡慕，但19世纪时并非如此，也未必能够保证会延续至21世纪。中国的大学可以跻身全球一流和最具吸引力的行列，并且正在通过特别的措施来吸纳全世界的天才，如清华大学的苏世民学者项目（Schwarzman Scholars Program）和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Yenching Academy）等。不过，尽管有美国资助的“十万强”（100000 Strong）计划试图把这一数量的美国学生送到中国学习（依然只相当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华的实际美国学生人数依然较少，并可能会维持现状，2015年仅为21,975名，比2014年的24,203名还有所减少。

就目前而言，中国学生涌入美国——以及英国、澳洲和日本等（人数不及留美但依旧不少）——的人数会继续增加。假以时日，大多数这些学生可能返回中国，并将作出重要贡献。然而与此同时，向美国的大规模教育移民或许主要不是源于对美国大学的信心，而是对中国国内院校的疑虑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前压迫和不安全的政治气氛下。除了把子女这个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本送到海外，中国的家长还在把真实资产送出国，将孩子和钱财同时输送到境外。此类行动未必会自动为美国带来好处，至少不符合一个多世纪前的伊利诺伊大学詹姆士校长的设想，对中国的近期前景而言则很难说是信任票。